

北朝研究

(第七辑)

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
大同平城北朝研究会

编



科学出版社
www.sciencecp.com

北朝研究

(第七辑)

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
大同平城北朝研究会 编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为北朝（含十六国与南朝）历史研究论文集，共收录了 25 篇文章。分别从各自不同的视角对该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进行了新的探索，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近几年该领域的研究成果和学术水平。

本书可供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等相关研究者阅读、参考。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北朝研究·第 7 辑 / 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 大同平城北朝研究会编.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 4

ISBN 978-7-03-027222-5

I. ①北… II. ①中…②大… III. ①中国—古代史—北朝时代—文集
IV. ①K239. 2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65972 号

责任编辑：孙 莉 郝莎莎 / 责任校对：陈玉凤

责任印制：赵德静 / 封面设计：陈 敬

封面题字：周谷城

科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0 年 4 月第 一 版 开本：787 × 1092 1/16

2010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17 1/2

印数：1—1 800 字数：406 000

定价：8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目 录

在“北朝都城与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	田余庆 (1)
北魏龙城诸后问题考实	李凭 (3)
十六国时期的商业与物资流通	刘驰 (19)
北魏平城考述	殷宪 (50)
大同操场城北魏太官粮储遗址初探	张庆捷 (84)
新平城、南平城、北新城考释	戴卫红 (93)
平城考古七十年	王银田 (98)
大同古城的历史变迁	张志忠 (110)
浅谈大同操场城北魏一号遗址的性质	曹臣明 (122)
北魏永固陵陵寝制度的几点认识	王雁卿 (127)
高昌文书中的柔然政治名号	罗新 (138)
“子贵母死”故事的社会必要性和他国历史前例的十个论点	刘宇卫 (145)
十六国时期的离散部落考察	李爱琴 (150)
北魏的军官制度及其演变	徐美莉 (158)
简论北朝时期少数民族政权对儒家伦理道德的传承——以孝道传承为研究 中心	刘国石 (167)
对魏晋南北朝时期“淫祀”现象的考察	李红艳 (177)
试论北齐文宣帝高洋之器识——兼论渤海高氏之家族精神气质	 李文才 李志刚 (185)
北魏殷绍——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算学博士	李海 吕仕儒 (200)
对3~6世纪佛事活动中工匠阶层的考察	尚永琪 (204)
云冈石窟的宝盖龛和宝盖	王雁卿 马志强 (222)
云冈石窟中的因缘故事表现	赵昆雨 (244)
孙吴政权中稀见荆楚土人的原因探析	陶新华 (259)
制度转型与财政体制变迁互动研究的新作——《转型期的北魏财政研究》 述评	马志强 (268)
富谷至先生关于玉门花海晋律解说的几处补充	曹旅宁 (271)
跋启功黄永年先生所书题唐李文墓志墨迹	曹旅宁 (273)

在“北朝都城与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

田余庆

(北京大学历史系 北京 100871)

谢谢各位！

首先，想就参加这次会议说几句话。我本来可以推辞，我从七十五六岁退出学术领域，实际上已经多年了，像这样的学术会议就不参加了。但是，这次我还是要来。首先我是为了感谢殷宪先生。因为从去年开始，就给我发出邀请，说要开这样的会，请我参加。后来，又好几次通信，谈的就不是会议的具体事情了，而是几个学术问题。我在这以前来大同还是2001年，当时自己手头正写了一些东西，脑子里带了一些问题。2001年来大同后，偶尔发现一些现象，这才开始作了一些探索，因此就写了这些东西（指先生的晚年力作《拓跋史探》中的祁皇墓等部分）。当时写这些东西，对我来说，就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以后，感到什么都是新的。到了殷宪先生的手里，就是本地行家看待这些东西了。其中有一些不足的地方，有一些证据欠缺的地方，自感认识不够的地方，考证当中一些环节上不周密的地方，殷宪先生他都看在眼里。他以工作上的便利，地域上的便利，后来就他所了解的情况，给我提供了一些信息，发现一些新的东西，这真是以文会友，我们这样就交往起来了。

殷宪先生给我提供的信息，主要有三次。一次是我个人发现祁皇墓，这个地名过去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上次我到大同来知道祁皇墓这个地名，感觉到它与拓跋三分时中部的猗顿之妻祁皇后有关。我到处找资料，寻找祁皇后与大同地区的关系。殷宪先生同意我的观点，并且告诉我，祁皇墓这个村庄现在还在，他本人去过。附近村庄还有叫靳圪瘩梁的地方，很可能与祁皇后墓有关。这个村还有一二百名厍姓的村民，是一千六七百年前守墓的乌桓族人，至今还住在那里。这就与我的思路结合了起来，使我自己对研究这个问题更加有信心了。这个信心不是在一个细小的问题上、小的侧面上建立的。祁皇本身是乌桓人，这是经过我多方考证的，有了这个材料，又压上一个砝码，进一步增加了我的信心。祁皇本身是乌桓人，这一点不需要证明，我的目的是要讲清楚，那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汉人撤出了大同这个地方，进来的是乌桓人、拓跋人。在这个地方不仅仅是打仗，而是两个民族在相互对立中又有斗争，又互通婚姻，在这种状态下共存了若干年，经过若干年之后，最后是拓跋族把代北控制下来了。

还有第二个问题，我想拓跋三分，其中有个中部，史书上记了一句话，中部是在代

郡之参合陂。历来被认为参合陂地点就在阳高，在阳高附近。这就是说拓跋中部的桓帝时期，也是拓跋的兴盛时期长期的中心就在阳高，而把大同放在一边。我自己感觉到大同在这个时期已经建起来了，到拓跋三分的中部，他不大可能死守在参合陂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旁边的一个枢纽的地方就是大同。我就感觉到，拓跋中部中轴所在地就应该在大同。拓跋三分也就是几代，过去我们说的拓跋早期的那些皇帝，其实也就是部落酋长。这些人，皇帝也好，皇后也好，在相当的时期，他们就死在大同，而且就葬在方山附近。这样的线索使得我考虑到在平城、方山之间，有一条通道。即在当时来说是拓跋政权统治者通向他们按照鲜卑族的习俗葬身的地方的道路。我考证了一个湖的位置，就是灵泉池，这是桓帝埋葬他的父亲沙漠汗和母亲封氏的地方。在我看来，根据有限的史料，弯来弯去，弯在这个地方。这是我个人的一种推断，但具体位置在哪里，还不能定案。殷宪先生，还有张庆捷先生一起经过实地勘察，进一步把这个宫、这个湖的方位、大小、周围的环境，灵泉宫、池与方山之间的距离，都搞清楚了。这对我来说又解决了一个大问题。因为考证了拓跋在当时大同的活动情况，也证明了方山下的灵泉宫一带很可能是与拓跋代魏金陵相区别的早期拓跋代国的一处重要的贵族墓葬区。

我还要讲到第三点，还是对殷宪先生表示感谢，这就是殷宪先生最近发现了一方墓志，是北齐的张謨墓志。从张謨墓志发现了北新城。这又是我正在做的一个题目，我根据代王猗卢碑写了一点东西，到后来发现另一件墨拓上写题跋的人自己来了一个误导，他说初见此碑时听商人说，猗卢碑是在绥远南面的达赖营发现的，而不是出在猗卢的死地雁门山中，也就是说猗卢碑不出在桑干河源。我写了一篇文章讲这个事情，还是坚持自己过去的观点，猗卢碑应该出在山西北部的雁门山中，文章发表后寄给了殷宪先生。这时还不知道这件新材料，就是殷先生从坊间访得朔州南的梵王寺所出北齐的北新城领民正张謨墓志。于是，殷先生也把他写的张謨墓志和北新城的文章寄给我，我们两人的意见完全一致。我是从史料上考证猗卢碑出在小平城南的雁门关内的结论不错，殷先生是从实际上考察，证明所谓的小平城、北新城就在这里，就是朔州南四十多里的梵王寺村附近这个古城遗址。这里的一些与拓跋代相关的地名是否确实，需要进一步证明，但是有的地名，如太子坟这个地名就颇能启发思路。我认为当时在这一地区，像太子坟这样的地名，作为口碑流传下来，也只有拓跋代这个时候。猗卢碑这件事就是这样。这是我们两人在拓跋代研究方面又一次重要的相会，这就是我这次应大同大学和殷宪先生邀请来参加会议的缘起，想借这次会议到北新城遗址看一看，也想借这个机会感谢殷宪先生。可以说，这是我这次大同之行的一种动力。

北魏龙城诸后问题考实

李凭

(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广州 510631)

一

《魏书》卷十三《皇后列传·文成元皇后李氏传》^①中记录了一则曲折的情感故事：

文成元皇后李氏，梁国蒙县人，顿丘王峻之妹也。有异于常，父方叔恒言此女当大贵。及长，姿质美丽。世祖（太武帝）南征，永昌王仁出寿春，军至后宅，因得后。及仁镇长安，遇事诛，后与其家人送平城宫。高宗（文成帝）登白楼望见，美之。谓左右曰：“此妇人佳乎？”左右咸曰“然”。乃下台。后得幸于斋库中，遂有娠。常太后问后，后云：“为帝所幸，仍有娠。”时守库者亦私书壁记之。别加验问，皆相符同。及生显祖（献文帝），拜贵人。太安二年，太后令依故事，令后具条记在南兄弟及引所结宗兄洪之，悉以付托。临诀，每一称兄弟，辄拊胸恸泣，遂薨。后谥曰元皇后，葬金陵，配飨太庙。

文中的永昌王仁是北魏太武帝的异母弟永昌王拓跋健之子。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年）九月，太武帝发兵进攻刘宋王朝，部署诸将分道并进。永昌王仁任征西大将军，于十月间率军自洛阳南下，攻陷刘宋的重镇寿春^②。在此次战役中，永昌王仁占有了“姿质美丽”的李氏，后来将她带到自己的镇所长安。

南征结束不久，北魏宫廷发生阉官宗爱发动的政变，太武帝被杀，国都平城陷入动乱之中^③。阉官宗爱的势力被镇压之后，太武帝的长孙文成帝于正平二年（即兴安元年，452年）十月登上皇位。由于当时文成帝年龄幼小，北魏的朝政被陆丽等权臣掌握，后宫则控制在太后常氏手中^④。为了控制局面，新的执政者大杀宗室诸王。兴安二

① 《魏书》，中华书局，1974年，第331页。

② 《魏书》卷四下《世祖纪下》“太平真君十一年九月”条，第104、105页；卷十七《永昌王健附子仁传》，第415页。

③ 抽文《论北魏正元年事变》，《晋阳学刊》1989年第6期。

④ 抽文《北魏文成帝初年的三后之争》，载《北朝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65~84页。

年（453年）七月乙丑，永昌王仁因谋反的罪名被赐死于长安^①。

永昌王仁死后，他的家属均被连累而徙往平城，内中就有入其门约三年的李氏。李氏被送入平城宫中，某日恰巧被文成帝“望见”，于是就有了上引史料中的一幕文成帝与李氏相会的情景。

经此相会之后李氏怀孕了，这在宫中是一件大喜事。常太后则持审慎的态度，她要认真核实李氏所怀胎儿是否真是龙种。幸亏李氏“得幸于斋库中”之事被守库者看到，并且写在墙壁上了。守库者的记录是值得采信的证据。不过，常太后仍不罢休，她又采用“别加验问”的方式进行深入的调查。

那么，李氏所怀是不是文成帝的亲子呢？对此，不仅我们这些时隔一千五百余年的后人难下结论，就是当时的人，由于科学发展水平的限制，也难作出准确的判断。所以，只能通过对当事人的陈述和旁观者的证言的分析，以及考察受孕的时间是否存在疑点，以此推断其真伪。在上引《李氏传》中，已经列有当事人之一李氏的陈述及守库者的证明，只是李氏受孕的时间方面是否存在疑点并未交代，这倒是应该查实的。

李氏所怀者就是后来的献文帝拓跋弘。拓跋弘是兴光元年（454年）七月庚子出生的^②，按照十月怀胎计算，李氏受孕的时间不应早于兴安二年的九月甲辰；假如因早产而怀胎时间缩短至七个月，则李氏受孕的时间不会迟于兴安二年的十一月癸卯^③。可见，李氏虽然原被永昌王仁占有，但是李氏的怀孕与永昌王仁无关，因为永昌王仁已经死于兴安二年七月乙丑。

然而，在进入平城宫之前的路途中，由于李氏身份低下，所处境况复杂，并不能完全排除曾与他人有染的疑点。这正是常太后要“别加验问”的理由，也是我们应该考察的问题。考察的关键则在于，兴安二年九月甲辰之前李氏是否已到平城。若李氏早于九月甲辰进入平城宫中，则其所怀确系龙种无疑。如果李氏晚于九月甲辰入宫，则其所怀是否龙种尚属两可；入宫时间越晚，可疑度便越大。换而言之，李氏入宫的日子只有在永昌王仁被赐死的七月乙丑至九月甲辰的40天之内，方可免于嫌疑。那么，李氏有无可能在不足40天里从长安来到平城呢^④？这主要是由两地之间的里程和李氏一行徒步的速度决定的。

自古以来，从长安到平城，除要渡过大小河道以外，均为土路。这些土路的走向后

^① 《魏书》卷五《高宗纪》，第112页；卷十七《永昌王健附子仁传》，第415页。

^② 《魏书》卷五《高宗纪》，第113页。

^③ 怀胎足月为九个半月，超过十月者较少。怀胎不足七月者，在古代的医疗条件下成活率是很低的。据《魏书》卷五《高宗纪》七月条和十一月条（第112、113页）的记载，文成帝于七月己巳由阴山还宫，至十一月辛酉出行信都、中山。则李氏怀胎即便不足七月，其受孕的时间也绝不会在十一月辛酉之后。

^④ 这个可以免于嫌疑的40天时区，包括从永昌王仁死的日子起至李氏等人启程的日子止的这段时间和李氏等人从长安走到平城所花的时间。虽然永昌王仁死的日子和李氏等人启程的日子应该很接近，但也不能认为这个40天都属于李氏等人从长安走到平城的时间，所以此处加以“不足”二字。

来发展成为修筑西安与大同之间的现代公路的基础^①。由于受到黄河渡口位置的限制，西安与大同之间的现代公路主要有五条路线：其一，西安—潼关—风陵渡—侯马—太原—山阴—大同，总长约 980 公里；其二，西安—韩城—河津—侯马—太原—山阴—大同，总长约 990 公里；其三，西安—韩城—河津—吕梁—宁武—山阴—大同，总长约 920 公里；其四，西安—延安—绥德—吴堡—吕梁—宁武—山阴—大同，总长约 930 公里；其五，西安—延安—绥德—榆林—府谷—宁武—山阴—大同，总长约 1080 公里^②。

上述五条西安与大同之间的现代公路的走向基本上反映了古代长安与平城之间的土路的轨迹。在这五条路线中，第五条路线大部分在今陕西省境内，路程最长，又主要在山区行进，民间通常不取这条路线。第三、第四条路线距离较短，但也在山区行进，其中的吕梁—宁武山地在北魏时期是政府难以控制的部落民出没的地区。第一、第二条路线大部分在今山西省境内，虽然比第三、第四条路线的距离长，但主要路段位于太行与吕梁两大山脉之间的谷地中，道路平坦，沿途市镇一向较为密集，是自古以来官方和民间通常采取的路线。李氏等人当年徙往平城的路线应该是第一条路线或第二条路线。

从当时至今已经超过 15 个世纪，西安（长安）往大同（平城）的各条路线均有较多局部的变化，尤其是将土路修筑成公路时这种变化更加明显。因此，古代土路的距离和相应的现代公路的里程之间必然会有一定的差距。但是，上述各条路线的总的走向却变化不大。因此，在难以计算古代土路距离的情况下，现代相应的公路里程就成了最为重要的参照数据。若按现代公路里程推测，认为当年李氏等人从长安前往平城的土路路程在 900 ~ 1000 公里之间应该是不为过的。按此计算，李氏等人只需每日平均徒步将近 25 公里，就可以在不足 40 天内抵达平城。被押往平城的李氏等永昌王家人虽然不少是妇孺，但由于路况较好，且又时值秋高气爽，这样的行进速度是可以达到的。

事实上，李氏究竟入宫于何日，该日是否在永昌王仁死后的 40 天内，如果不在此 40 天内又该如何甄别李氏怀孕的疑点。考证这些问题，对于 15 个世纪之后的我们来说是十分困难的事情。我们只能按照现代的距离和常规的速度作出李氏可能在免于嫌疑的时限内入宫的推测。但是，对于当时控制北魏后宫的常太后而言，要查清这些问题倒并非难事。尤其是李氏入宫的日期，只需招来有司，便可问明。

虽然常太后“验问”的对象和内容史家没有作记录，但其结论已有，那就是“皆相符同”。要之，常太后是在找不到确凿破绽的情况下，才承认李氏所怀为文成帝亲子的。由此也反过来证明，在李氏受孕的时间上并不存在纰漏。

^① 平城位于今大同市城东，见拙文《北魏时期雁北的城邑》，载《晋秦豫访古》，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 55 页。关于长安（西安）与平城（大同）之间的路程走向，参照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四册《东晋十六国·南北朝时期》，地图出版社，1982 年，图 46-7、图 52、图 54、图 55；西安地图出版社编制《中国城乡公路网及里程地图集》，西安地图出版社，2006 年，第 33 ~ 35、127 ~ 129 页。

^② 根据《中国城乡公路网及里程地图集》，第 33 ~ 35、127 ~ 129 页。

常太后对李氏所怀是否为龙种进行认真的考察，本是合乎情理的。文成帝生于太平真君元年（440年）^①，兴安二年与李氏相会之时仅仅14虚岁，对男女之事尚处于朦胧阶段。《李氏传》中记载，文成帝与李氏相会之前竟曾征求随从的意见，“高宗登白楼望见（李氏），美之。谓左右曰：‘此妇人佳乎？’左右咸曰‘然’。乃下台”。从文成帝幼稚的言语中不难看出，男女相会之事对于文成帝尚属初试^②。因此，客观地讲，常太后对李氏怀孕的事情持审慎的态度是应该的。不过，常太后何必颇费周折地“验问”呢？她只需径直向文成帝询问，便可知道事情发生的时间、地点以及情节，从而作出正确的判断。

作为当事人之一的李氏，曾被常太后仔细询问过，《李氏传》载有李氏回答询问的原话，称“为帝所幸，仍有娠”。然而，在《魏书》中却未见同样具备当事人身份的文成帝被询问的记载。是《魏书》的作者疏漏了，还是事实上文成帝的确未被询问过呢？值得注意的是，史家特意在常太后“验问”之前用了“别加”二字，从而告诉我们，常太后“验问”的对象是两位当事人以外的人。细品“别加”二字，不免感到颇有现代所谓“背靠背”地调查的意味。

上述迹象令人不得不猜测，常太后的“验问”，并非单纯地为了查明李氏所怀是否真是文成帝的亲子，而是在于常太后的内心并不赞成眼下发生的文成帝宠幸李氏的事实，因此她要以这种“背靠背”的调查形式给李氏和文成帝施加压力。这种猜测由后来发生的两件事情得到证实。其一，在验实李氏所怀确系龙种之后，常太后对李氏的嫌恶依旧不减，从而迫使文成帝不得不将李氏带出平城宫，去到阴山之北临盆分娩^③。其二，李氏最终被常太后“令依故事”而处死了。

所谓“故事”，即子贵母死之制，指的是北魏开国皇帝道武帝确立的处死储君生母的制度^④。正如业师田余庆先生指出的那样：“道武帝时期国家转型，面对具有强大影响力的历史传统，乃行子贵母死加以扭转，并因此形成制度。”^⑤子贵母死虽系祖宗定制，然而是否执行，与当政的皇帝或太后的意志密切相关。《李氏传》记载李氏被杀的年份为太安二年（456年），但并未记载具体的月份。按照子贵母死制度，李氏应该死于其子拓跋弘被立为储君之前不久，拓跋弘被立为太子的时间是太安二年二月丁巳^⑥，丁巳为该月朔日，则李氏死的时间应在当年的正月。拓跋弘是兴光元

^① 《魏书》卷五《高宗纪》序，第111页。

^② 文成帝虽然年幼，但并非不能生子。北魏的帝王大多早婚早育，详见拙著《北魏平城时代》第四章第一节之一《拓跋氏早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97~200页。

^③ 《北魏平城时代》第三章第三节之二《立冯氏为后》，第177~186页。

^④ 拙文《北魏子贵母死故事考述》，《山西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第69~74页。

^⑤ 田余庆：《拓跋史探》之《北魏后宫子贵母死之制的形成和演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9页。

^⑥ 《魏书》卷五《高宗纪》，第115页。

年七月庚子出生的，母亲李氏被杀时他年仅一周岁半，刚刚断奶。常太后除掉李氏真是迫不及待。

既然李氏颇受文成帝宠爱，且又孕育了龙种，常太后为何不顺水推舟落个人情，却非要对李氏苦苦相逼并最终置其于死地呢？对此，拙著《北魏平城时代》中作过专门的探讨^①，认为：常太后果排除李氏的目的，是为了扶持文成帝的另外一位贵人冯氏；正是由于常太后的扶持，贵人冯氏才登上了皇后的宝座。不过，常太后除李扶冯的动机何在，由于偏离该书的主旨较远，当时未加考证，只是将它简单地归结为，“出于长期控制文成帝的目的，对比李氏与冯氏两人的情况，常氏当然不愿选择年龄较大而又深受文成帝钟情的前者”^②。这样的解释似无差错，但只是停留于表面的看法。那么，常太后除李扶冯有无宿怨旧恩方面的原因呢？

二

在《魏书》卷八三上《外戚上·李峻传》中有关于贵人李氏家族的记载：“李峻，字珍之，梁国蒙县人，元皇后（李氏）兄也。父方叔，刘义隆（南朝宋文帝）济阴太守。高宗遣间使谕之，峻与五弟诞、嶷、雅、白、永等前后归京师。拜峻镇西将军、泾州刺史、顿丘公。雅、嶷、诞等皆封公位显。”^③李氏的父亲名方叔，曾在刘宋朝任济阴太守。李氏有兄弟六人，他们因文成帝的招谕而投奔北魏，并“封公位显”。联系《李氏传》的记载知，李家兄弟的显贵是李氏身后之事。李家早先远在南方，与常太后家必无宿怨。不过，李氏虽然出身官宦之家，但不幸被永昌王仁掳占，永昌王仁死后又沦为罪家眷属而被押解入宫。是不是因敌国臣民的身份和不光彩的经历引起常太后的嫌恶，李氏才会受到排挤呢？

对此，应该提出来作比较的当然是受常太后扶持的冯氏。《魏书》卷十三《皇后列传·文成文明皇后冯氏传》载：“文成文明皇后冯氏，长乐信都人也。父郎，秦、雍二州刺史、西城郡公，母乐浪王氏。后生于长安，有神光之异。郎坐事诛，后遂入宫。”^④竟然与李氏一样，冯氏也是以罪家眷属的身份没入宫中的。关于冯氏的家族，结合《魏书》卷四上《世祖纪上》延和元年（432年）十二月条、卷八三上《外戚上·冯熙传》、卷九七《冯跋传》及所附《冯文通传》等的记载可知：冯氏的伯祖冯跋和祖父冯弘先后为北燕国王；冯氏的父亲冯郎与伯父冯崇、叔父冯邈在北燕灭亡之前投降北魏；冯邈后来参与北魏对柔然的战争，因失利而投奔柔然；冯郎

① 《北魏平城时代》第三章第三节之二《立冯氏为后》，第177~186页。

② 《北魏平城时代》第三章第三节之二《立冯氏为后》，第186页。

③ 《魏书》，第1824页。

④ 《魏书》，第328页。

于延和二年（433年）二月到达平城，被任命为秦、雍二州刺史，后获罪被诛^①。看来，冯氏不仅为罪臣之女、叛臣之侄，而且是敌国君主的后裔。对魏朝而言，冯氏的身世并不强于李氏多少。

值得注意的是，身为太后的常氏原本只是文成帝的乳母。常太后的事迹见于《魏书》卷十三《皇后列传·景穆恭皇后郁久闾氏传附高宗乳母常氏传》：“高宗乳母常氏，本辽西人。太延中，以事入宫，世祖选乳高宗。慈和履顺，有劬劳保护之功。高宗即位，尊为保太后，寻为皇太后。”^② 这位能够置后宫众妃生死沉浮的常太后，竟然也是“以事入宫”的。

关于常太后入宫以前的情况，《魏书》卷八三上《外戚上·常英传》中有所透露：“初，（常）英事宋（氏）不能谨，而（王）睹奉宋甚至。就食于和龙，无车牛，宋疲不进，睹负宋于笈。至是，宋于英等薄，不如睹之笃。谓（常）太后曰：‘何不王睹而黜英？’太后曰：‘英为长兄，门户主也，家内小小不顺，何足追计。睹虽尽力，故是他姓，奈何在英上？本州、郡公，亦足报耳。’”^③ 文中，常英是常太后的兄长，他是常家的嫡长子；常太后庶出，宋氏是她的亲生母亲；王睹是常太后的妹夫。这段文字告诉我们，常家曾经迁居和龙，那里是常太后入宫之前一度生活过的地方。

和龙又称龙城^④，《通典》卷一七八《州郡八》营州条载：“慕容皝以柳城之北、龙山之南，所谓福德之地也，乃营制宫庙，改柳城为龙城，遂迁都龙城，号新宫曰和龙宫。……后燕慕容宝、北燕冯跋相继都之。至慕容云，为冯跋所灭；至冯弘，为后魏所灭也。”^⑤ 龙城曾是前燕的国都，以后成为北燕的都城。

常太后入宫于“太延中”，太延是北魏太武帝的年号，共四年，太延中当指太延二年或三年。《世祖纪上》载，延和三年（434年）六月北魏大举进攻北燕，到太延二年（436年）五月攻下龙城^⑥。北燕灭亡的太延二年五月与常太后入宫的“太延中”，这两个时间相合，表明《常英传》中所言常家“就食于和龙”的时间属于魏燕战争以前的北燕统治时期。也就是说，常家原先是北燕的臣民，而非北魏的臣民。显然，在北燕灭亡之前，常太后以及常家很难有机会自动来到北魏境内。因此，从常太后入宫于北燕灭

① 《魏书》，第81、1818、2126、2127页。

② 《魏书》，第327页。

③ 《魏书》，第1817页。

④ 龙城位于今辽宁省朝阳市境，见王仲荦《北周地理志》附《魏书地形志营州所统郡县考证》昌黎郡龙城条，中华书局，1980年，第1132、1133页。

⑤ 杜佑：《通典》第五册，中华书局，1988年，第4716页。

⑥ 《魏书》，第84、87页。

亡前后推测，她可能是被魏军从燕国迁徙到平城后进入宫中的^①，这与史家所谓的“以事入宫”之意是相照应的。

太武帝末年的政治动乱给了乳母身份的常氏发迹的机会，她在动乱之中“保护”了文成帝，动乱之后便将文成帝控制在手，进而攫取了北魏后宫的权势^②。常氏于兴安元年十一月被尊为保太后，兴安二年（453年）三月被尊为皇太后^③。常氏的身份虽然骤升至无以复加的地步，但是她以往的微贱出身却是无法抹掉的^④。所以，以常太后自己这样的出身，无论对于李氏的身世，还是冯氏的身世，就都不存在嫌恶的理由。

那么，是不是冯氏个人具有十分出色之处，足以打动常太后，而非令常太后除李扶冯不可呢？据《冯氏传》载，冯氏“年十四，高宗践极，以选为贵人，后立为皇后”^⑤。冯氏被选为贵人是文成帝即位后不久的事情，时为兴安元年。冯氏于太安二年被立为皇后^⑥，该年应为十八虚岁。不过，关于冯氏的年龄，《冯氏传》的记载是自相矛盾的。按冯氏十四虚岁被选为贵人推算，冯氏应生于太延五年（439年）。又，《魏书》卷七下《高祖纪下》称，冯死于太和十四年（490年）^⑦。则冯氏享年五十二虚岁。但是，在《冯氏传》中却分明地记着冯氏享年为四十九虚岁^⑧。倘若按照冯氏死于太和十四年时四十九虚岁计算，她应该生于太平真君三年（442年）。那么，兴安元年冯氏被选为贵人时仅仅十一虚岁，太安二年冯氏被立为皇后时仅仅十五虚岁。对于上述史料中记载的冯氏年龄的误差，目前尚难甄别对错。我们姑且承认冯氏十四虚岁时立为贵人，十八虚岁时立为皇后。十四至十八虚岁的冯氏，身心尚处于渐趋成熟的阶段，即便再有心计，在长她一辈而且富有政治经验的常太后面前，恐怕也难以施展其影响力，更不要说去左右常太后的行为了。常太后除李扶冯，应有更深层的原因，与冯氏本身的能力与影响关系不大。

在冯氏的家族中，有一个人倒是值得重视的，那就是冯氏的姑母。冯氏的姑母见于

^① 在延和、太延年间，北魏向北燕发动过多次进攻，伴随这些进攻发生过多次大规模的徙民。见于《世祖纪上》的记载有，延和元年九月，“徙营丘、成周、辽东、乐浪、带方、玄菟六郡民三万家于幽州，开仓以赈之”；延和二年六月，“（冯）文通守将封羽以城降，收其民三千余家”；延和三年六月，“辛亥，抚军大将军、永昌王健，司空、汝阴公长孙道生，侍中古弼，督诸军讨和龙，芟其禾稼，徙民而还”；太延元年七月，“己卯，（乐平王拓跋）丕等至和龙，徙男女六千口而还”；此外，太延二年五月北燕灭亡，魏军也会获得一定数量的俘虏，但《世祖纪上》未载。从常太后入宫于“太延中”猜测，她可能是上述某次徙民中的一员。

^② 《北魏文成帝初年的三后之争》，第65~84页。

^③ 《魏书》卷五《高宗纪》，第115页。

^④ 常太后虽然攀上了北魏后宫权力地位的顶峰，但在史家的眼里她永远也抹不掉出身乳母的背景，所以她的传虽然可以列在《皇后列传》之中，但是只能附着在北魏史上毫不出名的景穆恭皇后郁久间氏之传的后面。

^⑤ 《魏书》，第328页。

^⑥ 《魏书》卷五《高宗纪》太安二年正月乙卯条，第115页。

^⑦ 《魏书》，第166页。

^⑧ 《魏书》，第330页。

《冯熙传》中，但记载得十分简略：“（冯）熙姑先入掖庭，为世祖左昭仪。”^① 冯熙为冯氏之兄，两人的姑母是太武帝的左昭仪。《皇后列传》记载：“（道武帝）始立中宫，余妾或称夫人，多少无限，然皆有品次。世祖（太武帝）稍增左右昭仪及贵人、淑媛、中式数等，后庭渐已多矣。高祖（孝文帝）改定内官，左右昭仪位视大司马……”^②。由这条记载知，北魏宫中定有品位，左昭仪设置于太武帝朝，地位崇高，仅次于皇后。

这位冯左昭仪的父亲是北燕国王冯弘。因避献文帝拓跋弘的讳，在《魏书》只称冯弘的字文通。《冯文通传》载：“（冯）文通遣其尚书高颙请罪，乞以季女充掖庭，世祖许之。征其子王仁入朝，文通不遣。其散骑常侍刘训言于文通曰：‘虽结婚和通，而未遣侍子，……’”^③ 从散骑常侍刘训所言“虽结婚和通”之语可以看出，冯弘虽未向北魏遣送侍子，但“以季女充掖庭”却是事实。这位季女应该是上文所谓“先入掖庭”的冯左昭仪。冯弘遣高颙向北魏请罪之事发生于延和三年闰三月辛巳^④，冯氏姑母入宫时间应在此后不久，其受封为左昭仪的时间则在更后。

冯左昭仪对后来以罪家眷属身份没入宫中的幼年冯氏给予很多照顾，这有《冯氏传》中的记载为证：“世祖左昭仪，后之姑也，雅有母德，抚养教训。”^⑤ 那么，冯左昭仪在她的侄女被选为贵人和立为皇后的过程中是否发挥过作用呢？特别是，受常太后乳养与控制的文成帝当上皇帝之初，由冯左昭仪“抚养教训”的冯氏便随即被选为贵人，而后不久又登上皇后的宝座，这就不免会让我们将冯左昭仪与常太后联想到一起。不过，经过太武帝末年激烈的宫廷斗争之后，无论是外朝还是后宫都发生了很大的人事变化^⑥，因而实在难以猜测冯左昭仪的生死及其在文成帝朝的情况。冯左昭仪与常太后虽然同是见诸太武帝朝后宫的人物，但当时她们的地位相差悬殊，两人之间是否存在私交旧恩，由于宫廷事秘，就更难探明了。

遍寻常太后除李扶冯的原因，真是百思不得其解。不过，常太后与冯左昭仪及其侄女冯氏同是出自龙城的北燕国遗民，这倒是她们与来自南方的李氏之间显著的不同处。在冷漠的宫廷生活中，对失去家族联系的宫人而言，故国故土之情是十分珍贵的，它能够成为建立和维系宫人之间的情感的纽带^⑦。那么，故国故土之情是不是常太后扶持冯氏的思想根源呢？

^① 《魏书》，第1819页。

^② 《魏书》，第321页。

^③ 《魏书》，第2128页。

^④ 《魏书》卷四上《世祖纪上》，第84页。

^⑤ 《魏书》，第328页。

^⑥ 《北魏文成帝初年的三后之争》，第79~83页。

^⑦ 在北魏后宫里，宫人们常结为所谓“同火人”。《北魏平城时代》第四章第三节之四《北魏宫廷里的女官》中对“同火人”作了解释，认为“共同的命运，共同的环境，迫使宫人们互相同情，互相帮助，从而结成所谓的‘同火人’”，见于第249页。在此，笔者要补充说明，故国故土之情应该是建立和维系“同火人”的重要纽带。

三

宫廷中生活的人颇多顾忌，常太后也不例外，但她在对自己后事的安排上，却暴露了真实的情感。

《常氏传》载：“（常太后）和平元年（460年）崩，诏天下大临三日。谥曰昭，葬于广宁磨笄山，俗谓之鸣鸡山。太后遗志也。依惠太后故事，别立寝庙，置守陵二百户，树碑颂德。”^① 常太后的葬地，没有附在北魏皇陵之下，也不在平城的周围，而是选择了远离魏宫的广宁磨笄山中^②。文中的“依惠太后故事”一语，透露了常太后不附葬皇陵之下的理由。惠太后是太武帝的保姆，她与常太后有相同经历，太武帝即位后被尊为保太后，随后被尊为皇太后。《魏书》卷十三《皇后列传·明元密皇后杜氏传附世祖保母窦氏传》载：“（惠太后）真君元年崩，时年六十三。……谥曰惠，葬崞山，从后意也。初，后当登崞山，顾谓左右曰：‘吾母养帝躬，敬神而爱人，若死而不灭，必不为贱鬼。然于先朝本无位次，不可违礼以从园陵。此山之上，可以终托。’故葬焉。别立后寝庙于崞山，建碑颂德。”^③ 惠太后所言“于先朝本无位次，不可违礼以从园陵”是将她别葬于崞山的正当理由。按照此例，常太后也便有了不附葬于皇陵之下的理由。不过，北魏辖境山陵众多，常太后为何非要选定磨笄山为终托之所呢？

原来，磨笄山的得名与一则典故相关。《史记》卷四三《赵世家》赵襄子元年条载：“襄子姊前为代王夫人。简子既葬，未除服，北登夏屋，请代王。使厨人操铜鉶以食代王及从者，行斟，阴令宰人各以鉶击杀代王及从官，遂兴兵平代地。其姊闻之，泣而呼天，摩笄自杀。代人怜之，所死地名之为摩笄之山。”该条之下〔正义〕引《括地志》云：“摩笄山一名磨笄山，亦名为（鸣鸡）山，在蔚州飞狐县东北百五十里。《魏土地记》云：‘代郡东南二十五里有马头山。赵襄子既杀代王，使人迎其妇。代王夫人曰：以弟慢夫，非仁也；以夫怨弟，非义也。磨笄自杀而死。使者亦自杀也。’”^④ 这则典故发生在春秋末年，描述了夹在赵国与代国激烈冲突中的代王夫人的矛盾心理与悲惨结局。冲突的双方，赵国是代王夫人的娘家，代国则是她的夫家。冲突的结果，代王被杀，代国灭亡。亡国失家的代王夫人“泣而呼天”，陷入极度的痛苦中。她既不能“以弟慢夫”，又不愿“以夫怨弟”，只得“摩笄自杀”。这则典故凄凉感人，直到北魏时仍

^① 《魏书》，第327~328页。

^② 北魏广宁县位于今河北省涿鹿县西，见《北周地理志》附《北魏延昌地形志北边州镇考证》燕州广宁郡广宁条，第1105页。

^③ 《魏书》，第326页。崞山位于今山西省浑源县境，见《北周地理志》附《北魏延昌地形志北边州镇考证》恒州繁峙郡崞山条，第1056~1060页。

^④ 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第1793、1794页。文中“亦名为”下的“鸣鸡”二字系点校者所加。

在流传，郦道元注《水经》便有记载^①。选定磨笄山为葬地的常太后，肯定知道代王夫人自杀的典故。

从常太后的家世推测，她肯定会深切地同情代王夫人的遭遇，理解代王夫人的情感。《常英传》记载：“兴安二年，追赠（常）英祖、父，苻坚扶风太守亥为镇西将军、辽西简公，渤海太守澄为侍中、征东大将军、太宰、辽西献王。”^② 常太后的祖父常亥曾在前秦苻坚朝任扶风郡的大守。扶风在西汉时称为右扶风，与京兆尹、左冯翊合谓三辅，是拱卫京师的要地，苻坚时属司隶校尉，辖前秦京师长安以西的部分县^③。可见，常亥在苻坚朝是相当受器重的。常太后的父亲常澄当过渤海郡的大守，但不知是前秦的官职还是后燕的官职。渤海郡领南皮等10县，辖有今河北省的东南部沧州市一带^④。要之，常家是宦官之家，常太后的祖辈前秦时曾在关中为官，父辈时东迁到黄河下游的渤海郡任职；由本文第二节的考证又知，常家在常太后的长兄常英这一辈时成了北燕国臣民，一度生活在龙城。

《常英传》称常家是因“就食”来到龙城的。在就食龙城的路途中，常太后的妹夫王睹与常家生活在一起，则王睹即便不是赘婿，也是依附于常家的人。可见，来到龙城的常家，虽然已“无车牛”，却仍然是一个大家庭^⑤。常家后来在龙城的生活如何，已无从得知详情，但仍能窥出一点信息。常太后已经有妹夫王睹，说明常太后原本有过丈夫，因为按一般大家庭的规矩姐姐应在妹妹之前结婚。常太后既然能被选为乳母，说明她在入宫前刚生育不久，或者已经怀孕。那么，在此之前常太后是否还有亲生子女呢？在常太后发迹以后的封赐中，既没有她的丈夫，也没有她的亲生子女，他们可能早就不在人世了。常太后是“以事入宫”的，一个刚生育不久或者正在怀孕的青年妇女能够犯下何等大“事”呢？实在难以猜测。

不过，北魏出兵灭了北燕，才使常家的生活发生根本变化，迫使常太后离开故土与家庭而进入冷酷的宫廷，这倒是事实。虽然后来历史给予了契机，使常太后登上北魏宫廷权力的顶峰，但她付出了离乡背井、抛夫别子的沉重代价，这是终身难忘的。

再回过来细味代王夫人自杀的典故，便不难领悟常太后选定磨笄山为葬地的用意。

^① 详见郦道元注，杨守敬、熊会贞疏，段熙仲点校，陈桥驿复校《水经注疏》卷13《灤水》于延水又东条，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181、1182页。

^② 《魏书》，第1817页。

^③ 班固：《汉书》卷二八上《地理志上》右扶风条，中华书局，1962年，第1546页；房玄龄等：《晋书》卷十四《地理志上》雍州扶风郡条，中华书局，1974年，第430~432页。

^④ 《晋书》卷十四《地理志上》冀州渤海郡条，第424页；《北周地理志》卷十《河北下》冀州渤海郡条，第964页。

^⑤ 常家是一个大家庭，还可以从常太后发迹后其家受封官爵的人数众多看出。据《常英传》载，常家受封官爵的人有常太后母宋氏，常太后兄常英，常太后弟常喜及子常振，常太后的三个妹妹，常太后的妹夫王睹，常太后从兄常泰；此外，还有因本传脱误而不明其与常家关系者，如常欣及子常伯夫、次子常员，常伏、常宝、常泰等。见于《魏书》第1817页。

身在魏宫，心中却萦系着故土与亲人，她不能像代王夫人那样“泣而呼天”，只得借磨笄山的典故，含蓄地表达悲愤^①。常太后的内心世界于此可见一斑。如此深沉的眷念故土与亲人的感情，应该是常太后扶持同样出身燕国龙城的冯氏的思想原因。

被常太后选中为皇后的冯氏，后来当上了皇太后和太皇太后^②，她就是北魏历史上有名的政治家文明太后。无独有偶，文明太后在为其孙辈的孝文帝选妃之时，居然也有与常太后类似的感情倾向，从而更增强了笔者的上述看法。

《魏书》卷十三《皇后列传·孝文昭皇后高氏传》载：“孝文昭皇后高氏，司徒公肇之妹也。父颺，母盖氏，凡四男三女，皆生于东裔。高祖（孝文帝）初，乃举室西归，达龙城镇，镇表后德色婉艳，任充宫掖。及至，文明太后亲幸北部曹，见后姿貌，奇之，遂入掖庭，时年十三。”^③ 高家于孝文帝朝初年举室迁徙到龙城。此时的龙城已是北魏统治下的镇级建制单元。高氏虽然居处偏远，但是竟与孝文帝有缘，先被龙城镇挑选出来，送到平城；不久又被文明太后亲自选中，“遂入掖庭”。此事真是巧而又巧，其原因被史家归结为高氏“德色婉艳”之故。这样的解释看似合理，但是如果留意到高氏的年龄，就难以相信史家之言了。魏宫粉黛众多，要凭相貌脱颖而出，是相当困难的事；至于所谓的“德”，那就更是虚饰之词。只有十三虚岁的女童，怎么可能“德色婉艳”到居然令文明太后这样见多识广的妇人“奇之”的地步。那么，高氏被文明太后选中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联系前文关于常太后扶持冯氏的讨论，自然会注意到高氏是由龙城镇选送的，而龙城正是文明太后的故国所在。看来，文明太后见高氏而“奇之”的原因，或许正与其故国情感相关。不过，《冯氏传》称文明太后“生于长安”，当她出生之时其父亲冯朗已经投降北魏。那么，文明太后对远方的故国是否也怀有向往之情呢？为此，有必要追溯冯家与龙城的关系。

《冯跋传》载：“海夷冯跋，字文起，小名乞直伐，本出长乐信都。慕容永僭号长子，以跋父安为将。永为垂所灭，安东徙昌黎，家于长谷。……后慕容熙僭号，以跋为殿中左监，稍迁卫中郎将，后坐事逃亡。”^④ 冯家原居长乐郡信都县^⑤。文明太后的曾祖父冯安曾担任西燕国主慕容永的将领。西燕被慕容垂灭亡后，冯安归于后燕，后随慕容

^① 领悟常太后选定磨笄山为葬地的用意后，也就不难理解惠太后为何终托于崞山了。《窦氏传》载：“世祖保母窦氏，初以夫家坐事诛，与二女俱入宫。”原来惠太后与其二女都是因“夫家坐事诛”而被没入宫的。看来，惠太后所言“于先朝本无位次，不可违礼以从园陵”并非她终托于崞山的真实原因。究其实，惠太后是以“不从园陵”宣泄心中愤懑，是以终托于崞山向夺其家庭者控诉。

^② 冯氏于和平六年（465年）五月被尊为皇太后，见《魏书》卷六《显祖纪》，第125页；冯氏于承明元年（476年）六月被尊为太皇太后，见《魏书》卷七上《高祖纪上》，第142页。

^③ 《魏书》，第335页。

^④ 《魏书》，第2126页。

^⑤ 信都位于今河北省冀县城关，《北周地理志》卷十《河北下》冀州长乐郡信都条，第960页。